

白居易与中晚唐的党争

周 建 国

中晚唐的党争对当时文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广泛而深刻了。著名诗人元稹、李绅、杜牧、李商隐都不免受到党争的波涉，历来的文史论著对此已有很多论述。白居易虽未象其挚友元稹、李绅那样深深卷入党争，亦不如杜牧、李商隐那样因频受党争波及而屡屡将其感慨形诸笔墨；但由于白氏与某些朋党要人的特殊关系，党争对他的影响却颇为复杂、深刻。前人时贤对此曾有不少论述，可见历来研究者对此类论题的关注。

将有关论著通读一过，笔者深感其中虽有不少真知灼见，对探究白氏思想生平及其创作颇多启益，但诸如此类的论著也有不少沿袭旧史错误记载，陈陈相因，须待辨正之处。有的学者有见于此已偶有论及。本文试为专论，以期对白氏与中晚唐党争之关系作一番全面探讨，并对历来有关论著举要加以辨识，希望能获得海内外学者的指教。

一、白居易与元和三年制科考试及长庆元年进士考试之关系

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在记叙牛李党争的起因时，都把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及穆宗长庆元年（821）进士考试，这两桩讼案作为互有关联的党争始因。白居易在这两次喧腾争执的考试案中恰恰都担任考覆官，因之，论者往往根据史文

所载去推论白氏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如宋代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三年戊子”条论白居易《论制科人状》就以为“时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对策切直，宰相李吉甫泣诉于上，考官韦贯之等皆坐贬，故公极论之。公时亦为考覆官，唐朋党之祸盖始此，而公与李德裕不咸亦始此。”这种观点在宋代很流行，早于陈振孙的邵博在其《邵氏闻见后录》卷九中亦谓：“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深诋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诉于宪宗，以考官为不公，罢之。考官，白乐天也，故并为吉甫父子所恶。”此类说法广为现代学者所采摭，如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年谱》“元和三年”条谓：“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贬黜。其后李吉甫子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等‘党争’数十年，即种因于此。后居易屡为德裕所排挤，亦与此有关。”^①他如顾学颉、周汝昌先生选注的《白居易诗选》所附《白居易年谱简编》^②，王拾遗先生的《白居易生活系年》^③，所述大致相似。

推源先哲时贤所述白居易因考覆元和三年制科试而得罪李吉甫父子之说，大率由两《唐书》、《通鉴》的纪事演绎而来。然而证之唐人所记，类斯之说实大有问题。

首先，《旧唐书·李宗闵传》将牛李党争的起因归结于元和三年制科试引起的个人恩怨，既不符合事实，亦未深究根本。数十年前，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唐史余渚》等著作中对此作过纠驳。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元和三年牛僧孺等策试贤良，抨击时弊，矛头主要针对宦官，并未攻击宰相李吉甫。彼时引起轰动的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策文，今唯皇甫湜策文尚存。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而皇甫湜策文指斥时政明谓：“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夫褻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④岑先生据此以为，策文“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余乃悟牛、李（宗闵）新进气盛，牛又由韦

执谊而登第，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蕡同传。牛、李（宗闵）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⑤参稽唐人关于此事的原始记载，私意以为岑氏推断不失为诛心之论。由此而钩沉探微，益知唐人集部之可信远逾于五代、北宋人所撰之史书。披沙拣金，在读者之识力，援数例证之。

其时，白居易以考覆官身份有《论制科人状》奏述其事：“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之诬妄，斥而逐之，故并出为关外官。”^⑥白居易元和前期为官清直，抨击宦官，不遗余力，故对于牛僧孺、皇甫湜等人集矢宦官的策文大加赞赏。细读白文并无制举人攻击宰相的痕迹。

文宗大和五年（831），距此案已有二十余年。古文家李翱为此次科试的原主考官杨於陵作墓志曾追述其事曰：“会考制举人，奖直言策为第一，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为岭南节度使。”^⑦李翱文中明确指实彼时对策引起“中贵人大怒”，与皇甫湜策文集矢宦官之事实若合符节。唯“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一语须按当时朝局实际情况加以理解。盖其时宰相有郑絪、李吉甫，恐对策引起南北司矛盾激化，因而对朝官士人稍事裁抑以求朝局之平静。类斯情况在中晚唐史上不一见，如大和二年（828）刘蕡对策，猛烈抨击宦官，士林感动。及刘蕡落第，士人上疏相继，朝廷及考官仍不敢取刘蕡及第。故读者切不可望文生义，将“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一语理解为策文攻击宰相所致。事实是，皇甫湜策文中有明显赞扬宰相之语，文中提到“宰相忧勤奉职”，并建议皇帝应“日延宰相与论文理”。其中对皇帝、宰相也有微婉规讽：“以陛下之明圣，夫岂不欲国之得乎人？”

以宰相之公忠，夫岂不欲人之足用乎？盖从来已久，因循如是耳！”^⑧这样善意的规讽与攻击毫不相干。此点还可从李翱女婿郑亚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得到证明。

大中元年（847），李党要人郑亚出任桂管观察使，赴任途中拜谒牛僧孺于衡州。郑氏幕僚李商隐代府主撰拟《为荥阳公贺牛相公状》即以赞美口气，提及当年对策之事。状云：“始者召入紫宸，亲承清问，仲舒演《春秋》之奥，孙宏阐《洪范》之微，抉摘奸豪，指切贵近。”^⑨如果牛僧孺当年对策确实攻击过李吉甫的话，那么这对于牛李两党的要人来说，应是十分敏感的事。以郑亚对李德裕的敬重亲密而言，他怎么可能去赞美那种攻击过李吉甫的策文！状文提到“奸豪”，指跋扈藩镇；“贵近”，指宦官之辈，与上文所引皇甫湜、李翱文中所述情形亦基本相符。

由是观之，牛僧孺等所抨击的实是“中贵人”、“贵近”、“奸豪”，而非宰相。《旧唐书·李宗闵传》把元和三年对策作为牛李党争之起因不符合客观事实。《旧唐书·王涯传》、《新唐书·李宗闵传》的类斯记载，同样是以误传误。可见，以往不少论著在论及白居易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关系时据旧史加以推演，忽略唐人集部的更早记载，乃是其致误之由。

其次，《通鉴》变易《旧唐书·李宗闵传》等说又提出长庆元年进士考试为党争起因说，并将这次考试讼案与元和三年科考试讼案作牵强附会的联系，断言个人恩怨为党争之始因。此又不可不细加辨说也。《通鉴》卷二四一记长庆元年事曰：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章之弟；裴谔，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

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元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这段似是而非的记载误传了近千年。直到现代业经岑仲勉、傅璇琮等学者对此作了辨正后，不少文史论著及有关白居易的论著仍是抄膺《通鉴》了事。本文再从唐人的早期材料着手，来进而论证《通鉴》此段纪事的不实之处。其谬误撮要归纳为以下数端。

其一，诚如岑仲勉、傅璇琮等已指出的，所谓党争垂四十年云云连计年都不确^⑩。李德裕大中三年贬死崖州，上距长庆元年仅二十九年。德裕死后，李党即成不能复燃之死灰。大中后期唐朝廷内南北司矛盾渐趋激化，史书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牛李党争继续的记载了。

其二，以《通鉴》纪事本身分析，笔者以为其根本不具备牛李党争之性质。被指责为“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的，固然有后来成为牛党党魁李宗闵、要员杨汝士的亲属，但也有被史家目为李党的裴度、郑覃等人的子弟。按照《通鉴》所述，李德裕首发其难之目的在于向牛党人士施倾轧，那么他怎么反将自己所敬重的裴度、郑覃等人的子弟也同加指斥呢！其牵强附会，牴牾不通，于此可见。

其三，从唐人记载细辨事件真相，笔者以为此案之首发其难者是元稹、李绅、段文昌，李德裕其时资望不及元、段，不过附议而已。唐范摅《云溪友议》明谓：“元公即在中书，论与裴晋公度子撰及第，议出同州。”元稹后与裴度有嫌，此事为一原因。《旧唐书》取材较杂，纪事之间往往真伪糅杂，读者须细心辨识。如《旧唐书·王起传》述此事较得其实，可与范摅所述相

映证。其曰：“其年，钱徽掌贡士，为朝臣请托，人以为滥。诏（王）起与同职白居易覆试，覆落者多。……先是，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及元稹、李绅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试之科。”

总之，李德裕时在翰林，与元稹、李绅情谊相得，又与裴度、郑覃交谊亲厚。他于当年科举讼案虽按理附议，实非首发其难者。其时，不论李德裕，抑或牛僧孺、李宗闵均未入相，还不足以分朋立党。《通鉴》以此事为牛李党争之起因，不符史实。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于白居易考覆此番科试的是非上来加以评判。按之史实，李吉甫父子于元和三年科试既无恶考覆官白居易之迹，而李德裕于长庆元年科试亦无恶考覆官白居易之迹。且李德裕同另一考覆官王起相知多年，交谊极深。在考覆中，王起、白居易秉公办事，处置得宜。白居易有《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上奏朝廷，王起连署同奏曰：“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今重试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已委婉指出初试中确有舞弊。是故，白氏与王起在覆试中“苦考得失，其间瑕病，纤毫不容”，结果把裴度、郑覃、李宗闵、杨汝士等显宦家子弟均予黜退。但状文也指出重考之时，监考过于严苛，请朝廷“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⑩白居易身为考覆官，特重名器，不徇私情。但争讼的两方，元稹、李绅是挚友；李宗闵、杨汝士是姻亲或好友。他只能希望朝廷妥善处置不使双方矛盾激化。

最后，通过对白居易参预两次科试考覆的考察，本文得出与旧史及宋人笔记所载相异的认识。这些认识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观点亦有不同，甚或相反。

这两次考试讼案与后来的牛李党争没有直接关系。牛李党争的主因不在于个人恩怨，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纵向的历史联系看，牛李党争和元和时期李吉甫、裴度主张摧抑藩镇，而

李逢吉之流“常怒吉甫、裴度”（《旧唐书·李德裕传》）有渊源。长庆中，德裕与僧孺俱有相望。而李逢吉秉政欲引僧孺，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牛李相权之争实为党争之初因。大和以后，随着党争之深入，其是非涉及吏治、科举、攘外、平叛等方方面面。白居易于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诗酒自娱不复出矣。但他对于党争的是非曲直仍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未忘情于政治。此其一。

宋人笔记及白谱多以为白居易考覆元和三年科试开罪于吉甫父子。稽之事实，率皆臆测，并无实据。而长庆、宝历间，德裕镇浙西，居易刺苏、杭，二人频有唱酬，类斯事实足可破宋人笔记及白谱之妄说。此其二。

白居易在两次科试考覆中遵从舆情，秉公办事，显示了一位儒官文士正直尽职的品质。尤其是在科试涉及的南北司矛盾中白氏不怕得罪宦官，而在朝官内部矛盾中则严守中立，公事公办。白居易之为人及处事原则每于此见其立身大节。此其三。

二、白居易与姻亲杨氏兄弟之关系

旧说于白居易与姻亲杨氏兄弟之关系多有附会枝蔓之论，此种附会又与上述科举讼案有所关联。《旧唐书·白居易传》曰：“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此段叙述真伪混杂，不可不辨。其谓大和以后牛李党争激化，较得其实；但谓“杨颖士”为白居易姻亲，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按《旧唐书·白居易传》复加引伸，其曰：“从唐文宗时开始，牛李党争剧烈，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

读了他的诗，改变对他的成见。”^⑫其称“杨颖士”，“是牛党重要人物”，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范氏为著名史学家，有关论者都乐从其说，奈此说并不可据。所谓“杨颖士”，其人，在两《唐书》、《通鉴》的记载中仅偶见于上引《旧唐书·白居易传》一段文字之中，其人生平事迹无从细考，何得成为牛党重要人物？不然，在两《唐书》、《通鉴》关于牛李党争的大量记载中何以没有“杨颖士”参与党争的丝毫行迹？而今之学者不察本末，误将“杨颖士”派入牛党要人，又以误传将白居易算作牛党。即以杨殷士其人论，其虽为白居易妻弟，长庆元年白居易考覆之时秉公将其黜落，光明磊落，并无徇私之迹。《旧唐书·杨汝士传》附殷士事迹，谓“殷士与郑朗等覆落，因改名鲁士。复登制科，位不达而卒。”可见，牛党中实无“杨颖士”这么一个重要人物。

白居易与姻亲杨汝士、杨虞卿情谊相得。二杨确为牛党重要人物。但白氏在牛李党争中并不偏袒牛党，更没有因二杨之关系卷入党争。他在士大夫朝官的党争中严守中立，处事很有原则。

杨虞卿为人热衷贪墨，劣迹昭著，一度成为牛党极有影响的人物。白氏与杨氏兄弟相契甚早。元和二年，白居易有《宿杨家》、《醉中留别杨六兄弟》诸诗，诗中有云：“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杨六，即杨汝士。杨家居长安靖恭坊。

《两京城坊考》卷三谓杨汝士“与其弟虞卿、汉公、鲁士同居，号靖恭杨家，为冠盖盛游。”元和三年，白居易娶杨汝士、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十一年，白氏《与杨虞卿书》追述二人相知之深有云：“且与师皋（虞卿字），始于宣城相识，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谓故矣。又仆之妻，即足下从父妹，可谓亲矣。”^⑬大和时期，杨虞卿依附李宗闵，窃踞高位，因卷入错综复杂的党争，两次遭贬逐，竟不得善终。

大和时期朝中党争尖锐复杂，除牛李党争外，还有郑注、李训新贵集团分别同李德裕、李宗闵等元老重臣的争斗。杨虞卿两次被贬的原因各不相同。其第一次外贬在大和七年（833）三月。是年春李德裕入相，因杨氏依附李宗闵招权纳贿，“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旧唐书·杨虞卿传》）李德裕乃奏请朝廷出之为常州刺史。其时，白居易有《送杨八给事赴常州》、《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诸诗记其事。前诗云：“无嗟别青琐，且喜拥朱轮。五十得三品，百千无一人，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此外无过醉，毗陵何限春。”诗语表面上劝其知足常乐，实则在谆谆告诫这位姻兄不要贪居禄位，应该尽职守，做好官。此诗可说是白氏在牛李党争中对杨虞卿的委婉规劝，语重心长，用意良苦，亦可见白居易人格之高尚。

杨虞卿第二次外贬在大和九年（835）七月，事涉郑注集团与牛党李宗闵等的斗争。大和八年十月，依附宦官入掌大政的李训、郑注等新贵，迫使李德裕出镇浙西，复引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入相。大和九年四月，李宗闵召杨虞卿入京，委以工部侍郎京兆尹的要职。这时牛党与李训集团矛盾激化。《新唐书·杨虞卿传》载：“京师讹言郑注为帝治丹，剔小儿肝心用之。……帝不悦，注亦内不安，而雅与虞卿有怨，即约李训奏言：‘语出虞卿家。’”文宗大怒，下虞卿诏狱。李宗闵援救而遭谴逐，杨虞卿贬虔州司马，不久抑郁死于贬所。白居易有《哭师皋》诗伤其冤死，痛斥郑注之辈的造孽。诗中有云：“妻孥兄弟号一声，十二人肠一时断。往者何人送者谁？乐天哭别师皋时。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冤冤唯我知”。白居易对牛李党争一向采取公正谨慎的态度，而对郑注、李训那样的野心家及阉寺之辈则一向嫉恶如仇。在晚唐朝局翻覆多变，各种矛盾交叉斗争的情形下，他虽不能象早年那样直言极谏，但退居闲职后仍能是是非非，进退以

义，可算得当时士大夫中难得的有识之士。他没有象挚友元稹、李绅那样深深卷入朋党之争，没有象杜牧那样结好于牛党要人，也没有象李商隐那样出入于两党权要幕府反受党争之害。宋代晁公武极赞白居易“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

（《郡斋读书志》卷一八）晁氏从白居易似乎是明哲保身的表象上看到了他的是非之心，立身大义，颇为深刻。

三、长庆宝历时期白居易与李德裕唱酬事迹考

旧说因元和、长庆科试讼案于白氏与李德裕之关系亦多有附会不实之论。上文所引邵博《邵氏闻见后录》、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诸说皆为显例，而影响甚广。考稽唐人第一手材料，并无李吉甫恶白居易之迹。至于白居易长庆、宝历时期与李德裕唱酬事迹则可从唐人集中细考而得，足可破除邵博等所谓“白乐天并为吉甫父子所恶”的小说家言。

长庆、宝历时期，白居易先后出守杭州、苏州。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开府润州（今江苏镇江），苏、杭在其管辖之内。白居易因挚友元稹、刘禹锡与李德裕之唱酬，也参与唱和。白居易集中还保存了彼时奉和李德裕的诗三首，前人偶或论及，语焉不详。细探诸诗，有助于澄清旧时关于白、李关系的一些牵强不实之论。长庆四年（824），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有《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载白集卷二十。诗云：

箕颍人穷独，蓬壶路艰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
岩树罗阶下，江云贮栋间。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清景徒堪赏，皇恩肯放闲？遥知兴未足，即被诏征还。（其一《因严亭》）

翠嶽公门对，朱轩野径连。只开新户牖，不改旧风烟。
空室闲生白，高情澹入玄。酒容同座劝，诗借属城传。自笑

沧江畔，遥思绛帐前。庭台随事有，争敢比忘筌？（其二《忘筌亭》）

其时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已两年，政绩颇著。李诗原唱已佚，但就白氏和作观之，诗专就仕隐进退说话，寓有赞美德裕治绩、雅情之意，充满同僚之间的友善情谊。长庆二年七月，白氏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九月，德裕由御史中丞出为浙西观察使。二人由京职出任外官原因不同，但对当时朝局的失望不满却是一致的。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细考白诗以为，白氏远在大和党争激化之前已萌生退休之志。其引白氏杭、苏任上诗为证：“初至杭州，尚云：‘欲将闲送老，须著病辞官。更待年终后，支持归计看。’……后刺苏州，又云：‘一日又一日，自问何留滞。为贪逐日俸，拟作归田计。’”一面做官，一面安排退归之计，也正是李德裕当时的思想。盖当初德裕受宰相李逢吉排挤出镇浙西不久，即于洛阳伊川建平泉山庄以示归去之志。故白诗其一《因严亭》所谓“清景徒堪赏，皇恩肯放闲？遥知兴未足，即被诏征还”云云不仅切合自身，亦符合德裕情状。其二《忘筌亭》所谓“酒容同座劝，诗借属城传”云云盛赞德裕高情雅意，亦反映出白居易、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诸人唱酬之频。元稹已于长庆三年冬赴越州任浙东观察使。他与李德裕分镇浙东、浙西，情谊深厚。据白诗可知越州与润州之间往来诗简常由在杭州的白居易为之传递。宋人小说家言谓李德裕因元和三年科试案而恶白居易，竟致于三传成真，几乎论定，实未将此类诗什细细一读。

白居易《奉和李大夫新题诗二首各六韵》仅存，诸人之诗已不得而见。然其诗旨颇可与宝历元年李德裕所作《近于伊川卜山居将命者画图而至欣然有感聊赋此诗兼寄上浙东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鹤》（《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九），以及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居》（《刘禹锡集》卷三七）相参证。刘诗步

李诗韵，俱从仕隐说起。李诗云：“弱岁弄词翰，遂叨明主恩。怀章过越邸，建旆守吴门”自谓凭文才受朝廷重用。又云：“西圯阴难驻，东臯意尚存。渐逾六百石，愧负五千言”明显有倦宦归去之意。刘禹锡和诗有云“早入八无数，尝承三接恩。飞鸣天上路，镇压海西门”赞李德裕大才，而主眷甚隆。又云：“清望寰中许，高情物外存。……洛下思招隐，江干厌作藩”又极赞德裕清高绝俗之致。又云：“丹禁虚东阁，苍生望北辕”愿其大展宏图，入相秉政。可惜此番唱酬中的元稹和诗又不传。但从白居易《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居》诸诗看，长庆、宝历间李德裕声望颇著，入相呼声甚高。白、刘其时与牛僧孺也相友善，而因党争初起，诸人间的交往尚无顾忌。

宝历元年秋冬之交，李、元、白、刘诸人都在相近地方任职，文字交往更趋频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首唱《霜夜对月听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此诗在《全唐诗》卷四七五尚存六句。浙东观察使元稹和作已佚。唯苏州刺史白居易，和州刺史刘禹锡和诗全存。晚唐罗隐有《薛阳陶吹觱篥歌》赞美诸人唱酬盛况，其云：“平泉上相东征日，曾为阳陶歌觱篥。吴江太守会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罗隐句下自注：“平泉为李德裕，……苏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并有和篇。”（《全唐诗》卷六六五）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听月对小童吹觱篥歌》也述及元、白和诗：“吴门水驿接山阴，文字殷勤寄意深”。这“文字殷勤寄意深”不正反映出元稹、白居易对李德裕的友好情谊吗？而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更是能够说明他与李德裕当时关系的重要文献。白诗除描写音乐之妙外，又推许主人李德裕高情雅意：“明旦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⑭有的研究者受到所谓李德裕恶白居易的旧说影响，遂谓白诗“专就阳陶言之，未及德裕一字，不心许

之意，可以想见”^⑮。细味白诗，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今就白居易长庆、宝历时期奉和李德裕所存三诗的记载，并参稽同时唱和的元稹、刘禹锡等之情状，以及此后罗隐诗的有关记述，统而观之，读者可以了解到白居易在杭、苏任上与李德裕交往酬酢，友善而有情谊。这些唐人的原始材料更足以破除旧史及宋人笔记关于白居易因考覆科试为李吉甫父子所恶，并受李德裕排挤的不实之词。

四、大和以后白居易与牛李党魁的关系

白居易与牛党党魁牛僧孺、李宗闵谊兼师友，与牛党要人杨虞卿兄弟为姻亲。由于这些特殊关系，随着大和以后牛李党争的激化，白居易避免卷入党争而求分司东都洛阳，闲适自遣。这与白氏在士大夫党争中严守中立的处事原则是相符的。大和时期，牛李党魁的相权之争最为激烈。其时，白居易与牛僧孺、李宗闵只有很少应酬关系，而与李德裕几乎没有什么交往。这样的远嫌避患正是白居易研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现象。

大和三年（829），裴度荐李德裕为相。八月，德裕奉诏入京，时李宗闵有宦官之助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出德德为郑滑节度使。这种行径为朝中正直之士所不齿。刘禹锡于德裕出镇郑滑时有《送李尚书镇滑州》诗称颂：“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希望德裕一旦在朝秉政，大展宏图。次年正月，宗闵引牛僧孺再度入相，形成牛党专权局面。《新唐书·李德裕传》曰：其时宗闵“引僧孺协力，罢（裴）度政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逐之。”被排挤出朝的就有白居易的好友元稹、裴度。元稹出充武昌军节度使，裴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大和五年九月，李德裕已在西川节度使任。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等以唐旧地维州请降，德裕受降并具奏其状，且陈出师收复之利。事下尚书省集议，朝臣皆请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沮其

功，令德裕遣返降将，结果悉怛谋等遭到吐蕃主的残酷杀害。牛李此事之争是非判然。

在李宗闵、牛僧孺辅政之时，引用杨虞卿，由右司郎中，再迁给事中。《新唐书·杨虞卿传》述杨氏兄弟等利用科举舞弊：

“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和时期的牛李党魁的相权之争带有明显的政治是非，涉及到用人、边防、科举等一系列政策。其时，牛僧孺、李宗闵长期执政；李德裕仅于大和七年至八年执政一年余，便在郑注集团和李宗闵等的联合排挤下被迫出镇浙西。白居易早期怀有兼济天下的大志，中年以后频遭打击，兼之身多疾病，思想有所变化。尤其是大和三年，白氏因病归东都以太子宾客分司，随着朋党斗争的激化，牛党执政者的庸碌无为，更坚定了他独善其身之志。但他晚年思想仍颇复杂，还时时表现出对国事民生的关心，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示对现实政治的是是非非。

大和四年，牛党专权，迫元稹、裴度等大臣出朝。白氏当年《不如来饮酒》诗有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亦可谓感慨深沉。

大和七年，白氏姻亲杨虞卿等依附李宗闵，利用科举营私舞弊。李德裕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次年，杨汝士、杨虞卿兄弟分别寄诗、寄茶与白居易。白氏有《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有云：“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兄弟东西官职冷，门前车马向谁家？”其时正李德裕执政，白诗虽述杨氏兄弟仕途失意，并未归怨执政。吟诗品茗的潇洒对热衷于仕宦功名的杨氏兄弟应是一帖很好的清醒药剂。联系杨虞卿遭贬初，白氏《送杨八给事赴常州》诗中“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等许多正意相劝之句，亦可见白氏用心良苦，而是非分明。

大和八年，李宗闵复入相，排斥异己，汲引党羽。《旧唐书·郑覃传》：“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迁秘书监。”同时，召杨虞卿入京为工部侍郎。李宗闵又欲征召白居易入朝，白氏作《寄李相公》诗，婉言谢绝，以示不愿参与党私之争：“渐老只谋欢，虽贫不要官。唯求造化力，试为驻春看。”

牛僧孺曾数度任相，大和四年、五年、六年连续三年秉政，为其一生执政最长的时期。恰在此时，白居易与牛氏往来篇什很少，大和六年冬，牛僧孺出镇淮南。白居易有《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诗云：“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盖元和三年牛氏对策上第，居易尝为试官。诗语诙谐，而明确表示自己已无仕进之意。大和、开成之间，白氏又有《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诗云：“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车十四年”，也可说是白氏以达则兼济的正论劝勉这位宰相门生，开成以后，牛氏无意于争权，转趋明哲保身之道，此与白居易经甘露之变，更坚定其中隐的哲学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合拍的。牛氏于开成二年五月至开成三年九月任东都留守，与白居易、刘禹锡诸人同在洛阳，唱和转趋频繁。短短数年间，白氏致牛氏诗什有二十多篇，与大和年间只有一、两篇酬和之作形成鲜明对比。个中缘由，似可深究。其时，白居易与牛僧孺、刘禹锡诸人相互唱和的内容，大部分涉及饮酒、歌伎，抒写个人的人生享受。这也标志着白氏及其门生牛氏思想与生活方式的某种演变，值得深思。

至于白居易与李德裕，他们在大和、开成、会昌二十年间没有直接交往。这是由于激烈的党争，以及白氏与牛党权要人物的特殊关系，双方有意避开了。开成元年秋冬，李德裕以太子宾客分司之职在洛阳平泉山居小住。其时，刘禹锡亦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而白居易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李、刘、白三人同在洛阳。刘与李唱和有《酬李相公喜归乡国自巩县夜泛洛水见寄》等诗；

刘又与白唱和有《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等诗。唯李、白之间无文字交往之迹。然五代、宋初之孙光宪述李德裕与白居易此段情事，频多牵强附会，影响及于史乘、笔记、今人论著，尤须驳正。其《北梦琐言》卷一：“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此段纪事的错误很多。

其一，所谓“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年代错了。李德裕于开成元年七月由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九月中抵洛阳，至十二月初四离洛阳赴浙西观察使任。当白居易、刘禹锡在世之时，这是李德裕唯一的一次洛阳闲居。而刘禹锡正是在开成元年秋，罢同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

其二，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承袭《北梦琐言》之说，亦谓白居易屡寄文章于李德裕，李不欲看。”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此将刘禹锡改作德裕之亲信幕僚刘三复，可见此类说法出于传闻，不足为据。

其三，白居易集中曾有长庆、宝历时奉和李德裕诗三首。如果此时白氏屡屡向李德裕献文章，多到“盈其箱笥”，何以集中无一首记录？以白居易为人之高尚自尊怎会如此自卑地向李德裕投文献诗？

其四，所谓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之说，不仅见于小说家言，亦为史家所采摭。《新唐书·白敏中传》曰：“武宗雅闻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时，居易足病废，宰相李德裕言其衰恭不任事，即荐敏中文词类其兄而有器识。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进承旨。”言之凿凿，似无可疑，稽之事实，全无情理。今

据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补注十》：“白敏中会昌二年九月十三日自右司员外郎充。其月十五日，改兵部员外郎。十一月二十九日，加知制诰。”^⑥白敏中之进用，年月日均明确的然。而是年秋白居易已以刑部尚书致仕。以武宗之精明，何以不知大诗人白居易因年老多病致仕之事？论者甚或因此类传闻附会出武宗欲用白居易为相，更是设想过分。以武宗之励精图治，所任宰相李德裕、李绅、崔铉、李回、郑肃等，无不精强干练，岂会起用一个因病致仕的古稀老人！

由此可见，前引史学家范文澜语谓：“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云云，实误信史传，及小说家言，有不足信者。

最后，让我们回到白居易对牛李后期党争的是非上来作一番简要的评判。白氏后期对牛李两党的政策很少作直接表态，然会昌四年其作《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谢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白居易集》卷三七）表示了对两党是非的明确判断。诗云：“塞北虏郊随手破，山东贼垒掉鞭收。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对李德裕会昌年间外御回鹘内平叛镇的政策是颇为赞许的。石尚书即石雄，系李德裕执政时一手提拔的猛将。他在执行李德裕的御敌平叛政策中起了很大作用。会昌三年，石雄率师追击回鹘乌介可汗于杀胡山，迎太和公主还朝。次年，他又领兵功入上党擒获贼党郭谊等，以功进检校兵部尚书，迁河阳节度使。而牛党党魁对李德裕的内外政策都是反对的。当初乌介可汗率众犯边时，朝廷集议和战之策，太子少师牛僧孺倡言消极防守，提出对回鹘入侵“来即驱逐，去亦勿追”。宰相李德裕对此严加抨击，超拔石雄为大将，追击回鹘，终于赢得胜利。当朝廷讨伐泽潞叛镇时，牛党又百计阻挠。为保证伐叛成功，朝廷于会昌三年五月，改太子宾客李宗闵分司东都为湖州刺史。泽潞被平定后，牛僧孺竟出声叹恨，被贬为汀州刺

史。同时，再贬李宗闵为漳州长史。恰在此时，白居易写诗赞美战功卓著的石雄，这与牛僧孺、李宗闵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

综上所述，白居易在人事关系与私谊方面同牛党较为接近；而在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上则与元稹、刘禹锡相似，较为接近李德裕的政见。由于他同牛党的种种特殊关系，其对两党纷争的看法通常表现得很委婉。这种人事关系与政见倾向的矛盾很难被人理解。因之，历来对白氏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有许多误解。凡此种种只有通过原始材料或早期文献的细心考辨，才能祛疑解难，弄清真相。白居易中年以后转趋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其中原因很复杂。如朝政昏乱、宦官专权、身多疾病、佛道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曾引起论者的关注。但党争无疑是坚定他退归洛阳不复再出的一个重要因素。白居易与中晚唐党争，当然也是历代论者关注的课题。然而，在此类问题上传统的说法多有可商酌处，本文对此作历史的全面考察，并就其中一些代表性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笔者亟愿通过讨论，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进一步。

注：

①参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顾学颉、周汝昌著《白居易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页。

③王拾遗著《白居易生活系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④⑧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三。

⑤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0页。

⑥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所引白氏诗文均据朱金城笺校本。

⑦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见《全唐文》卷六三九。

⑨参见李商隐《樊南文集补编》卷四。

⑩参见岑仲勉《隋唐史》第四十五节注①，并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长庆元年”条，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⑪《白居易集》卷六十。

⑫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686页。

⑬《白居易集》卷四四。

⑭《白居易集》卷二一。

⑮参见朱金城《白居易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⑯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所收《翰林学士壁记补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页。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安庆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则

《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有“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一语，中华书局标点本“赵王”标人名线（1809页）。中华书局《后汉书人名索引》亦以“赵王”为人名（200页）。按此中大夫只一出，笔者以为，其人非姓赵名王，而为姓赵名王谋。一则封王很多之世，不可能以“王”为名而为“赵王”，况后汉赵王已甚多。再则“图不轨”即可，其义已明，不必“图”字前再赘一“谋”字。因此笔者认为此处应标“赵王谋”作人名，未知方家学者以为然否？

· 马斗全 ·